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南) 马尔科维奇

彼德洛维奇 编

郑一明 曲跃厚 译

南斯拉夫“实践派” 的历史和理论

YANJIUCONGSHU



重庆出版社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 历史和理论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川)新登字010号

Published by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P. O. Box 17, Dordrecht, Holland
1979

根据荷兰D.雷德尔出版公司1979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 郭明忠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忠 凤

〔南〕 马尔科维奇 彼德洛维奇 编
郑一明 曲跃厚 译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75 插页 4 字数 381千
1994年1月第一版 1994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000

ISBN 7-5366-2340-2/B·61

定价：8.00元

编者简介

米哈依洛·马尔科维奇是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科学艺术院院士、塞尔维亚共和国科学艺术院社会科学部学部主任。主要著作有：《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修正》(1952)、《逻辑学》(1956)、《当代逻辑学中的形式主义》(1958)、《意义的辩证论》(1961)、《人道主义和辩证法》(1968)、《实践的辩证法》(1968)、《当代马克思》(1974)、《科学的哲学原理》(1981)等。加约·彼德洛维奇是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萨格勒布大学教授、前《实践》杂志的两位主编之一。主要著作有：《英国经验论哲学》(1955)、《从洛克到艾耶尔》(1963)、《20世纪中叶的马克思》(1967)、《哲学和革命》(1971)、《实践的宗旨何在》(1972)等。

3155/25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说 到 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

义，就是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在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

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

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中 译 本 序 言

在当代纷呈复杂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本世纪60年代初，因布莱德认识论讨论会的分裂而崛起的南斯拉夫“实践派”无疑是屈指可数的重要派别之一。美国学者R·戈尔曼主编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对它作了这样的评价：“‘实践派’是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潮，赢得了国际公认，这是由于它用人道主义方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非教条式的、广泛的再评价，批判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实践。”戈尔曼的这本书对“实践派”的评价是否恰当，自然可以商榷，但它指出的“实践派”已赢得“国际公认”这一事实是不容否认的。

作为一场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实践派”有其固定的理论阵地，它通过《实践》、《哲学》等杂志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活动，发表见解，增进理解和交流，同时也扩大了自己的国际影响。在那汗牛充栋的个人专著、会议文集中，“实践派”主将米·马尔科维奇和加·彼德洛维奇联袂主编的本书，则明显地具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意义。因为它是在1974年《实践》和《哲学》杂志双双停刊、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活动被禁止以及1975尔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决定解除马尔科维奇等八名“实践派”成员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教职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出版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本书实际上成了一部忠实记述“实践派”的历史、思想和人物传记的“备忘录”。这无疑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该流派提供了

一个明了的“窗口”。

本书原名为《实践——南斯拉夫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考虑到在60、70年代的南斯拉夫哲学界，除了曾经一度称雄的“实践派”之外，“辩证法派”的存在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此外，从内容上看，尽管本书的头篇论文就是马尔科维奇的长篇大作《今天的辩证法》，可是通观全书后可以发现，书中的绝大部分论文所讨论的并不是与“方法论”有关的问题，因而，我们特地将原书名更译为《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以期更能体现本书的特质。

关于本书的两位主编米·马尔科维奇和加·彼德洛维奇的基本情况，读者可在附于书后的“撰稿人名录”中略窥一斑。这里所要补充的是，在1975年1月的解职事件中，米·马尔科维奇是首当其冲的八位教职员之一。马尔科维奇的个人命运，也许会更令读者感兴趣一些。实际情况是，1981年3月，米·马尔科维奇等六名教授被安排到贝尔格莱德社会科学研究so工作。同年，《实践——国际》杂志在美国创刊，他是其中的两位主编之一。在这一年里，他还出版了长约800页的科学哲学专著——《科学的哲学原理》。1983年，马尔科维奇晋升为塞尔维亚共和国科学艺术院院士。1984年，南斯拉夫德高望重的哲学家杜尚·涅迭里科维奇教授逝世，马尔科维奇接替了他的职务，担任了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社会科学部的学部主任。

一般说来，“实践派”的理论探讨主要表现为两大领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思考；一是对社会生活实践的批判考察。前者是“实践派”的共同思想基础，后者是其理论观点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应用。本书的内容虽然在编辑体例上分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和革命”、“文化、观念和宗教”以及“社会主义、官僚制度与自治”四大部分，但其中心思想仍然

离不开这两大方面。下面，我们拟就这两个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对“实践派”的观点作一初步分析。

一、关于“实践派”的哲学观

本书选入的“实践派”成员的哲学论文计有五篇，它们分别是：《今天的辩证法》（米·马尔科维奇）、《马克思哲学的意义》（米·坎格尔加）、《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种张力》（斯·斯托扬诺维奇）、《历史决定论的某些片面观点》（沃·米利奇）、《历史科学和历史哲学》（约·阿兰德耶洛维奇）。贯穿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米·马尔科维奇在《导论》的第四节“实践派的基本观点”中作了集中而又鲜明的概括。通过这一概括，马尔科维奇力图说明，在哲学的性质、出发点和方法论上，“实践派”都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精辟见地。

首先，马尔科维奇认为，尽管在规定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实践派”的内部有一些分歧，即有的人主张一种先于科学并完全独立于科学的“纯哲学”，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哲学可以囊括全部相关的科学知识和理论的发展。可是，在对哲学性质的认识上，“他们一致认为，哲学的基本职能在于提出能够指导人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全部活动的总体性的批判意识。由于它是总体性的，因而有别于各种不同的科学学科的零碎知识；由于它是批判的意识，它又比实证科学知识的一种简单总和要丰富得多。”（英文版，第XXVii~XXViii页）由此可以看出，“实践派”认为，哲学的基本性质不是别的什么，而在于它的总体性和批判性。哲学是一种总体性的批判意识。

应该指出，“实践派”对哲学性质的这种基本规定，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这种规定是不尽相同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屡次重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性有两条：一是它的实践性，即规定哲学不仅要解

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一是它的阶级性，即公然承认，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解放世界的思想武器。相反，“实践派”把哲学的性质抽象化为“总体性”与“批判性”，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的。从理论渊源上看，它继承了卢卡奇在本世纪20年代初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因为在哲学史上，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总体性的批判意识”的，恰恰是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往后，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倡的社会批判哲学所强调和遵循的也是卢卡奇的这一思想路线。

其次，在哲学的出发点上，“实践派”主张实践Praxis是哲学的出发点，因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这个问题从前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我国)的哲学界中有过较长时间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实践派”提出，实践(Praxis)是哲学的出发点。这不失为讨论中的一种观点。尤其是在对“实践”范畴的规定上，马尔科维奇等人对“实践”(Praxis)与“实践”(Practice)以及劳动和物质生产的严格界定(见英文版，第xxviii~xxix页)对我们深入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具有较大的启发性。问题在于，“实践派”在规定“实践”(Praxis)是哲学的出发点时，犯了两个基本错误。其一是，它把“实践”与“物质”范畴截然对立起来，认为承认“实践”范畴必然要抛弃“物质”范畴。因而在“实践派”那里，“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即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一般被认为是抽象的、与历史无关的二元论的观点而受到摒弃。”(英文版，第xxviii页)

“实践派”在把“实践”(Praxis)确定为哲学的出发点时，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它在区分“实践”(Praxis)同劳动和物质

生产的同时，借口它们必须具有“普遍性”，有一种抬高前者、贬损后者的倾向。因为在“实践派”看来，劳动和物质生产尽管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但由于它还是不自由的，因此，还不成其为“实践”(Praxis)，“只有当劳动成为自由的选择，并为个人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完善提供一种机会时，劳动才成为实践(Praxis)。”(英文版，第xxix页)殊不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是在承认劳动和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础的实践之上创立和发展的。没有劳动和物质生产这一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就谈不上什么科学、艺术等其他高级形式的实践的发展，更谈不上为所谓的“个人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完善”提供机会。所以，我们认为，在实践的形式与其抽象的关系问题上，“实践派”实质上是犯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分析黑格尔时所指出的那种颠倒了“物质具体”与“一般抽象”的关系的错误，黑格尔颠倒了桃子、梨与“水果”的关系，“实践派”则颠倒了劳动、物质生产与“实践”的关系。

第三，关于哲学的方法。在“实践派”那里，这其实反映了如何看待“辩证法”的问题。“实践派”如何看待“辩证法”呢？马尔科维奇在《导论》中承认：“使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团结起来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都拒绝正统的辩证法概念。”(英文版，第xxx页)“实践派”所谓的“正统的辩证法概念”指的又是什么呢？《导论》中紧接着也有说明，这指的就是“恩格斯的工作”，说白了是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而在当代哲学史上，正是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对恩格斯把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界的做法率先提出了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派”“拒绝正统的辩证法概念”的行为，只不过在新的条件下重复了卢卡奇的老调。

所不同的是，正像马尔科维奇所指出的，“实践派”同仁在“拒绝正统的辩证法概念”时，又分为两种人。一种人因此而从根本上丧失了对“辩证法”的兴趣；另一种人则仍然相信，“辩证法对批判哲学是恰当的方法，并一方面试图通过深入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及马克思著作中的内在辩证法，另一方面通过对当代其他方法（分析方法、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批判考察来发展辩证法。”（英文版，第xxx页）这后一种人，则显然是以马尔科维奇本人为代表。

从上述所提到的两种人中，我们可以看到，前一种人由于“拒绝正统辩证法概念”而从根本上对它失去了兴趣，因此，从“辩证法”此词的基本意义上说，他们可以称之为“辩证法的叛异”；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后一种人，企图以黑格尔的著作和当代其他科学方法来发展辩证法，由此而来的“辩证法”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呢？还是在《导论》中，马尔科维奇作了这样的交待：“根据这种观点，辩证法既不是一种绝对、抽象的精神结构（如黑格尔所说），也不是自然界的一种一般结构（如恩格斯所说），而是人类历史的实践及其本质方面的一种总体结构——批判思维。”（英文版，第xxxi页）试问，马尔科维奇这种将辩证法仅仅归结为人类历史实践的总体性的批判思维，不是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所主张的辩证法只是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辩证关系的说法，又是什么呢？

二、关于“实践派”的社会批判哲学

上述对“实践派”的哲学观的评述表明，“实践派”本质上是一股人本主义思潮，这股思潮在理论渊源上同卢卡奇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如果说卢卡奇所开创的这股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发展到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贯彻到实际生活领域，主要体现为社会政治批判哲学，其对象是

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异化现象的话，那么在“实践派”那里，作为其哲学观点之具体应用的同样是社会政治批判哲学，其对象则表现为对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异化”现象的分析和批判。

说社会政治批判哲学是“实践派”哲学观的必然逻辑归宿，并不是我们的主观臆断，马尔科维奇本人在《导论》中就是这样说的。他明确指出：“建立在实践概念基础上的哲学，自然特别注意其原则的实际结果；而且，从根本上说，这些结果是为了验证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这一观点所必须采取的步骤。”（英文版，第xxxii页）。此外，R·戈尔曼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也指出：“实践派”之所以赢得“国际公认”，一方面是由于它用人道主义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再评价，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批判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实践”。^①

“实践派”的社会批判哲学所包含的一系列观点都是以“人是实践的存在”这一命题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对它的分析自应从这里入手。

南斯拉夫“实践派”认为，无论是马克思的经济批判，还是政治批判，都有一个“哲学基础”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以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是被忽略了。这个“哲学基础”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人是实践的存在”。因此，在它看来，“关于特殊的社会制度的全部问题，如关于私有制、资本、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等等，归根到底就是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什么是人，他同其他人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究竟是利用还是浪费了其丰富的潜能？”（英文版，第xxxii页）

应该指出，“实践派”提出“人是实践的存在”这个命题，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看，是对人是劳动的创造物的认识的深化，

^① R·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702页。

因而具有某种启发性。但它把这个命题看作是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哲学基础”，似乎马克思后来一切研究的结论都派生于这一“哲学基础”，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人都明白，马克思早年学的是法律；后来对哲学发生了兴趣，19世纪40年代初，他在《莱茵报》等杂志上上发表的多篇文章，基本上是一种人本学的哲学批判；以后，对市民社会和经济关系的认识，才使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一次飞跃，从而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所以，正是对市民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研究，使马克思找到了一把打开社会历史秘密的钥匙。相反，自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30年代公诸于世后，企图以此大做文章，暴露所谓马克思的经济和政治批判的人本主义哲学基础的，恰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弗罗姆等人的手法。^①“实践派”的独到之处，则在于使这一基础更加逻辑化，具体提出了“人是实践的存在”这一命题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哲学人类学的论证。

从“人是实践的存在”出发，“实践派”推断出的一个更直接的结论——“全面异化论”。这是因为，在它看来，由于全部问题的根本就是人，社会政治批判的目的也无非是要“发现那些摧残人、阻碍人的发展并把某种简单的、易测的、单调而刻板的行为模式强加给人的特殊社会制度和结构。”因此，它认为，在批判各种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时，如果只是“用一种特定形式（社会主义）的观点抽象地否定另一种特定形式的社会组织（资本主义）”，这种批判就只能是一种“肤浅而偏执的批判”。“实践派”所主张的是一种“彻底而全面的人类批判”，其根本点

^① 在这方面，马尔库塞的代表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弗罗姆的代表作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译本均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